

GUAN ZHU JING DIAN YI SHENG ZHEN CANG

关注经典 · 一生珍藏



吕思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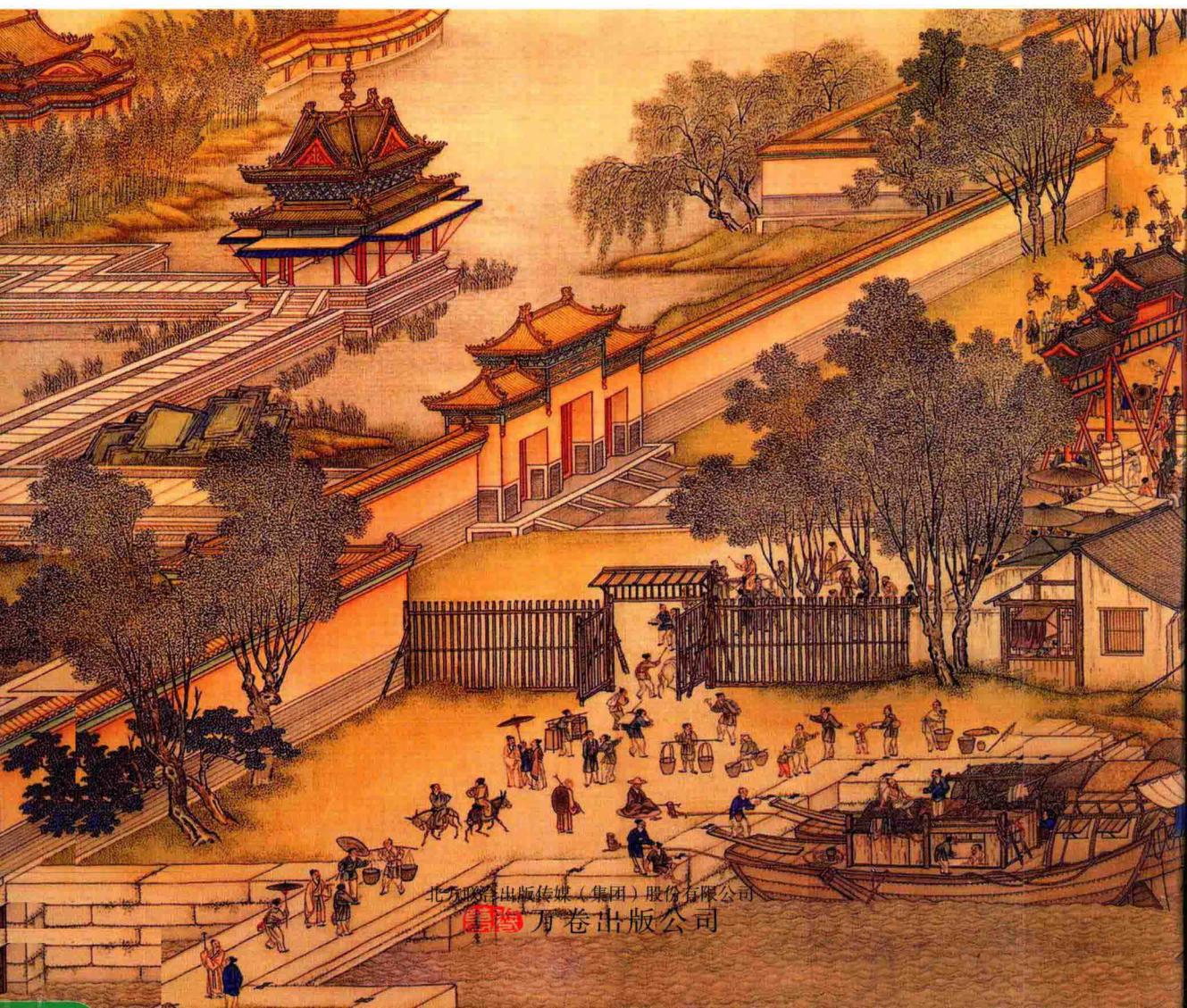
中国通史



ZHONGGUO TONG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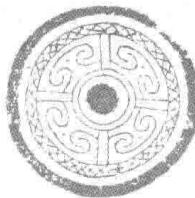
畅销七十年中国历史最佳入门读本

民国老课本——上海光华大学特制历史教科书，“史学四大家”权威著述，以意趣盎然的文化流变带动历史演进，简明扼要、浅显易读，历史初学者夯实基础第一书。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中国通史

ZHONGGUO TONGSHI

吕思勉 /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2014年·沈阳

© 吕思勉 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通史 / 吕思勉著.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4.11

(典藏 / 吴昊主编)

ISBN 978-7-5470-3075-2

I. ①中… II. ①吕… III. ①中国历史 IV. ①K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46798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78mm × 254mm

字 数：450千字

印 张：24

出版时间：2014年11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策 划：王会鹏 韩师征

责任编辑：梁晓蛟

封面设计：范 娇

版式设计：范 娇

责任校对：高 辉

ISBN 978-7-5470-3075-2

定 价：24.8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邮购热线：024-23284050

传 真：024-23284521

E-mail：vpc_tougao@163.com

腾讯微博：http://t.qq.com/wjcbgs

网 址：http://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请速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024-23284452



关 / 于 / 本 / 书 /

本书原是为适应抗日时期的大学教学需要而编写的学习教材，采用白话方式著述。全书分为上编和下编，上编以历史通性为入门点，叙述经济、政治和文化学术的流变；下编以时间顺序叙述史实变革，系统梳理纷繁的历史知识。作者以深厚的国学功底融合社会学、人类学等西学，行文严整而平易，加之全书史实清晰、注释明晰、见解独到，非常适合国学功底不深的历史初学者。为了方便阅读，本书修订了通假字，增加了注释，统一了纪年。

关 / 于 / 作 / 者 /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是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开史学研究之新风，也是国学大师钱穆的业师，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史学四大家”。他自幼善习文史经典，23岁后潜心专研史学，并从事教学工作，学生中包括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黄永年等人。吕先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穷经皓首，一生著作颇丰。其中，他的代表性论著，于20世纪40年代分上下册先后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对我国通史研究有着开创性的影响。

经典之藏，心灵之旅



读书是一件辛苦的事，读书又是一件愉悦的事。读书是求知的理性选择，同时，读书又是人们内在自发的精神需求。不同的读书者总会有不同的读书体验，但对经典之藏，对精品之选的渴求却永远存在。

传统上，读书是求学的手段，千百年来，人类知识的传承，最重要的总是通过书籍的记载与传述。因为有了书，人类才可以文脉延续，薪火相传。西哲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因而，先贤们都把读书当作高尚而庄重的事情，赋予读书神圣、光荣的使命感。故此，韦编三绝、悬梁刺股，以及凿壁、囊萤、映雪等等，就成了刻苦求学的典型，千百年来成为人们效法的楷模。于是，寒门学子挑灯夜读，富家子弟潜心求学，或诚心拜师，或自学成才，诸如此类的事例，就成了激励学子上进求学的传说故事而广泛流传。

书籍除了自身寓含的教化功能外，还能让人感到身心的愉悦和快乐。在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极力去寻找各种承载文明的载体，来填塞文化需求的饥渴。一本残破小书，可以在上百人的手中传递和阅读，看完后仍意犹未尽，不忍释卷。彼时，人们读书如饥似渴，却并无黄金屋、颜如玉一类的功利目的，有的只是内心的精神需求，读书的愉悦与快乐正在于此。仲春季节，读书间隙，推窗而立，鸟语花香扑面而来，内心深处则有禾苗拔节的哔剥之声回响；炎炎夏日，一卷在手，品茗读书，摇扇驱蚊，自然能感受到心灵的清凉和愉悦；秋风瑟瑟，听窗外传来淅淅沥沥的雨声，啜一口酽茶，想起“风声雨声读书声”的名联，便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数九严冬，寒意砭骨，围炉夜读或雪夜捧卷，书香入腹，情暖人心，又

能体验到视通万里、思接千载的悠悠遐思。

无论是求学求知还是寻求精神上的愉悦，读书都是我们的一种心灵之旅，是接受自我内心的召唤和灵魂的导引上路，让自己再次起飞得到新生的力量。变换的风景，奇异的遭遇，萍逢的客人……这一切旅途中可能发生的事件，都会在我们读过的书籍中出现，它们强烈地超出了我们已知的范畴，以一种陌生和挑战的姿态，敦促我们警醒，唤起我们好奇。在我们被琐碎磨损的生命里，张扬起绿色的旗帜；在我们刻板疲惫的生活中，注入新鲜的活力。

正因为读书之益，读书之趣，我们才对书籍本身挑剔起来。试想，灵魂之伴侣如何可以等闲视之呢？一本书的好坏，总会有无数人来品评，既有芸芸众者即兴点评，又有专家学者细心解析，然而，书籍最终的裁定者是历史而不是某一种潮流。随着时光的淘汰，留下来的经典之作渐渐走进更多人的视野，留在人们的案头，成为经典之藏。

“典藏”之作正如伴随我们的益友，多闻、博大、精彩而有趣，这样的益友，需要人们用心地品读，细心地筛选，最终把最好的“朋友”留在自己的身边。我们的“典藏”正是帮助读者挑“益友”的一种尝试，希望能把经典的、有价值的或者有趣的书籍放在读者的案头，让它们像朋友一样陪伴每一位读者走上了自己的心灵之旅。

当我们打开书本，走进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自然能够体验那种君临一切的奇特感觉。此时心如止水，宁静安然，恰如室外无言的星月，美文佳句不期而至时，或击案称绝，或吟哦出声，甘之如饴。愿这“典藏”之作能给我们的心灵留下一块绿荫，助大家在自己的漫漫行旅中搭起一座可供休憩的风雨亭，对抗庞大、芜杂、纷繁的外界侵扰。

序 言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是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开史学研究之新风，也是国学大师钱穆的业师，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史学四大家”。他自幼善习文史经典，23岁后潜心专研史学，并从事教学工作，先后任教于苏州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上海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吕先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穷经皓首，一生著作颇丰。其中，他的代表性论著，于20世纪40年代分上下册先后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对我国通史研究有着开创性的影响。

在这部著作之前，吕先生曾出版过我国第一部白话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本是上海光华大学文科学生的学习教材，因此沿袭了前者的白话著述方法，并对当时普遍流行的通史著作中存在的条理性缺失的问题加以改善。全书分为上编和下编，上编以历史中的通性作为入门点，分门别类地叙述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情况；下编以时间顺序叙述正史的史实变革，对纷繁的历史知识进行系统梳理。书中将各个要点标以序号来提示，以便学生快速掌握，还有将生涩的理论以日常之理来譬喻，使严肃的史论生趣盎然。整体看来，这部书的体例很适合功底不深的初学者。

此外，作者以深厚的国学功底融合社会学、人类学等当时的新学，上起远古时代，下至作者写作之年（1922），风云跌宕的古国历史在作者新方法、新思想的整理下严整而平易，不仅史实清晰，而且包含着作者的独特见解。严耕望一语道出本书的特点：“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顾

颉刚评价本书“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我社出版的这本《中国通史》，遵循《吕著中国通史》的原貌也分为上下两部分，并本着面向大众普及的原则做了现代化的编辑加工。首先，本书在将原书的繁体字转为简化字的同时，对难以理解的异体字也进行了转化或注释，还修订了不适于现代阅读的通假字，以去晦涩之味。其次，原书为竖版排版，其间穿插着很多作者自己撰写的注释，为了使读者更清晰地识别原文与注释，本书在改为横版排版以及保持原书随文注的同时，将作者的注释加小括号标明，而编者的注释则以六角号标明。再次，原书多以民国纪年来表示历史时间，即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来推算，这与当今读者的阅读习惯极其不符，对于梳理历史脉络十分不便，因此，本书均以通用的公元纪年做了注释。

在阅读本书之前，读者需要注意以下三点：其一，对历史的研究本就是百家争鸣，本书在旁征博引的同时，也带入了一些史观，读者可将此作为一种参考，并在书外博采众家之长，而不要纠结于观点的是非；其二，本书完成于抗日战争期间，作者对汉族反抗外族入侵的斗争特别加以强调，请读者客观看待；其三，20世纪20年代以后被公认的史实论断并未收录书中，编者对部分论断做了注释，如有未明处，还请读者谅解。

自序

我在上海光华大学，讲过十几年的本国史。其初系讲通史。后来文学院长钱子泉先生说：讲通史易与中学以下的本国史重复，不如讲文化史。于是改讲文化史。民国二十七年，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其初以中国文化史为各院系一年级必修科，后改为通史，而注明须注重于文化。大约因政治方面，亦不可缺，倘定名为文化史，则此方面太被忽略之故。用意诚甚周详。然通史讲授，共止120小时，若编制仍与中学以下之书相同，恐终不免于犯复。所以我现在讲授，把它分为两部分：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联结，以便两面兼顾。此意在本书绪论中，业经述及了。此册系居孤岛上所编，参考书籍，十不备一；而时间甚为匆促。其不能完善，自无待言。但就文化的各方面加以探讨，以说明其变迁之故，而推求现状之所由来；此等书籍，现在似尚不多，或亦足供参考。故上册写成，即付排印，以代抄写。不完不备之处，当于将来大加订补。此书之意，欲求中国人于现状之所由来，多所了解。故叙述力求扼要，行文亦力求浅显。又多引各种社会科学成说，以资说明。亦颇可作一般读物；单取上册，又可供文化史教科或参考之用。其浅陋误谬之处，务望当代通人，加以教正。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吕思勉识。

绪 论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作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哪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难道他是生来如此的么？无疑，是数十年的做官、经商、读书养成的。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了。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然则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已往的事情多呢，安能尽记？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报纸所记载的，奚啻亿兆京垓分之一。一天的报纸，业已不可

遍览，何况积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呢？

须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并不要把他已往的事情，通统都知道了，记牢了。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省，总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尝能把自己已往的事，通统记牢呢？然则要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已往的事，全数记得，只要知道“使现社会成为现代社会的事”就够了。然而这又难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它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对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则我们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

这正是我们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求，亦即在此。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代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往昔的历史，是否能肩起这种任务呢？观于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导致失败者之多，无疑是不能的。其失败的原因安在？列举起来，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翻开二十五史来一看（从前都说二十四史，这是清朝时候，功令上所定为正史的。民国时代，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业经奉徐世昌总统令，加入正史之中，所以现在该称二十五史了），所记的，全是些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纪世系。昔人称《左氏》〔即《左传》〕为相研书；近代的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的家谱；说虽过当，也不能谓其全无理由了。单看了这些事，能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么？从前的历史，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呢？这是由于历史是文明时代之物，而在文明时代，国家业已出现，并成为活动的中心，常人只从表面上看，就认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

何谓文化？向来狭义的解释，只指学术技艺而言，其为不当，自无待论。说得广

的，又把一切人为的事，都包括于文化之中，然则动物何以没有文化呢？须知文化，正是人之所以异于动物的。其异点安在呢？凡动物，多能对外界的刺激而起反应，亦多能与外界相调适。然其与外界相调适，大抵出于本能，其力量极有限，而且永远不过如此。人则不然。所以人所处的世界，与动物所处的世界，大不相同。人之所以能如此，（一）由其有特异的脑筋，能想出种种法子；（二）其手和足的作用分开，能制造种种工具，以遂行其计划；（三）又有语言以互相交通，而其扩大的即为文字。此人之所知、所能，可以传之于彼；前人之所知、所能，并可以传之于后。因而人的工作，不是各个从头做起的，乃是互相接续着做的。不像赛跑的人，从同一地点出发，却像驿站上的驿夫，一个个连接着，向目的地进行。其所走的路线自然长，而后人所达到的，自非前人所能知了。然则文化，是因人有特异的禀赋，良好的交通工具而成就的控制环境的共业。动物也有进化，但它的进化，除非改变其机体，以求与外界相适应，这是要靠遗传上变异淘汰等作用，才能达到目的的，自然非常迟慢。人则只须改变其所用的工具，和其对付事物的方法。我们身体的构造，绝无以异于野蛮人，而其控制环境的成绩，却大不相同，即由其一为生物进化，一为文化进化之故。人类学上，证明自冰期以后，人的体质，无大变化。埃及的尸体解剖，亦证明其身体构造，与现今的人相同。可见人类的进化，全是文化进化。恒人每以文化状况，与民族能力，并为一谈，实在是一个重大的错误。遗传学家，论社会的进化，过于重视个体的先天能力，也不免为此等俗见所累。至于有意夸张种族能力的，那更不啻自承其所谓进化，将返于生物进化了。从理论上说，人的行为，也有许多来自机体，和动物无以异的，然亦无不披上文化的色彩。如饮食男女之事，即其最显明之例。所以在理论上，虽不能将人类一切行为，都称为文化行为，在事实上，则人类一切行为，几乎无不与文化有关系。可见文化范围的广大。能了解文化，自然就能了解社会了（人类的行为，源于机体的，只是能力。其如何发挥此能力，则全因文化而定其形式）。

全世界的文化，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个问题，还非今日所能解决。研究历史的人，即暂把这问题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亦得。因为目前分明放着多种不同的文化，有待于我们的各别研究。话虽如此说，研究一种文化的人，专埋头于这一种文化，而于其余的文化，概无所见，也是不对的。因为：（一）各别的文化，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二）而世界上各种文化，交流互织，彼此互有关系，也确是事实。文化本是人类控制环境的工具，环境不同，文化自因之而异。及其兴起以后，因其能改造环境之故，愈使环境不同。人类遂在更不相同的环境中进化。其文化，自然也更不相同了。文化有传播的性质，这是毫无疑义的。此其原理，实因人类生而有求善之性（智）与相爱之情（仁）。所以文化优的，常思推行其文化于文化相异之群，以冀改良其生活，共谋人类的幸福（其中固有自以为善而实不然的，强力推行，反致引起纠纷，甚或酿成大祸，宗教之传布，即其一例。但此自误于愚昧，不害其本意之善）。而其劣的，亦恒欣然接受（其深闭固拒的，皆别有原因，当视为例外）。这是世界上的文化所以交流互织的原因。而人类的本性，原是相同的。所以在相类的环境中，能有相类的文化。即使环境不同，亦只能改变其形式，而不能改变其原理（正因原理之同，形式不能不异，即因形式之异，可见原理之同，昔人夏葛冬裘之喻最妙）。此又不同的文化，所以有共同原理的原因。以理言之如此。以事实言，则自塞趋通，殆为进化无疑的轨辙。试观我国，自古代林立的部族，进而为较大的国家；再进而为更大的国家；再进而臻于统一；更进而与域外交通，开疆拓土，同化异民族；无非受这原理的支配。转观外国的历史，亦系如此。今者世界大通，前此各别的文化，当合流而生一新文化，更是毫无疑义的了。然则一提起文化，就该是世界的文化，而世界各国的历史，亦将可融合为一。为什么又有所谓国别史，以研究各别的文化呢？这是因为研究的方法，要合之而见其大，必先分之而致其精。况且研究的人，各有其立场。居中国而言中国，欲策将来的进步，自必先了解既往的情形。即以迎受外来的文化而论，亦必有其预备条件。不先明白自己

的情形，是无从定其迎拒的方针的。所以我们在今日，欲了解中国史，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而中国史亦自有其特殊研究的必要。

人类已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我们试看，任何一个社会，在已往，大都有个突飞猛进的时期。隔着一个时期，就停滞不进了。再阅若干时，又可以突飞猛进起来。已而复归于停滞。如此更互不已。这是什么理由？解释的人，说节奏是人生的定律。个人如此，社会亦然。只能在遇见困难时，奋起而图功，到认为满足时，就要停滞下来了。社会在这时期就会本身无所发明；对于外来的，亦非消极地不肯接受，即积极地加以抗拒。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不论自然的和人为的，都系如此）。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这是世界所以一治一乱的真原因。倘使当其渐变之时，随时加以审察，加以修正，自然不至于此了。人之所以不能如此，昔时的人，都以为这是限于一动一静的定律，无可如何的。我则以为不然。这种说法，是由于把机体所生的现象和超机现象并为一谈，致有此误。须知就一个人而论，劳动之后，需要休息若干时；少年好动，老年好静；都是无可如何之事。社会则不然。个体有老少之殊，而社会无之。个体活动之后，必继之以休息，社会则可以这一部分动，那一部分静。然则人因限于机体之故，对于外界，不能自强不息地为不断的应付，正可借社会的协力，以弥补其缺憾。然则从前感觉的迟钝，行为的濡滞，只是社会的病态（如因教育制度不良，致社会中人，不知远虑，不能预烛祸患；又如因阶级对立尖锐，致寄生阶级不顾大局的利害，不愿改革等；都只可说是社会的病态）。我们能矫正其病态，一治一乱的现象，自然可以不复存，而世界遂臻于郅治了。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大的希望。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序》，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两大类：一为理乱兴亡，一为典章经制。这种说法，颇可代表从前史学家的见解。一部二十五史，拆开来，所谓纪

传，大部分是记载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的，志则以记载典章经制为主（表二者都有）。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是随时发生的，今天不能预料明天。典章经制，则为人预设之以待将来的，其性质较为持久。所以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史实确乎不外这两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须知文化的范围，广大无边。两间的现象，除（一）属于自然的；（二）或虽出于生物，而纯导源于机体的，一切都当包括在内。他综合有形无形的事物，不但限制人的行为，而且陶铸人的思想。在一种文化中的人，其所作所为，断不能出于这个文化模式以外，所以要讲文化史，非把昔时的史料，大加扩充不可。教育部所定大学课程草案，各学院共同必修科本有文化史而无通史。后又改为通史，而注明当注重于文化。大约因为政治的现象，亦不可略，怕改为文化史之后，讲授的人全忽略了政治事项之故，用意固甚周详。然大学的中国通史，讲授的时间，实在不多。若其编制仍与中学以下同，所讲授者，势必不免于重复。所以我现在换一个体例。先就文化现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我这一部书，取材颇经拣择，说明亦力求显豁。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以我之浅学，而所希望者如此，自不免操豚蹄而祝篝车之诮〔本句典故出自《史记·滑稽列传》，是作者谦虚地自嘲要以微薄的付出换得丰厚的回报，也可以理解为抛砖引玉〕，但总是我的一个希望罢了。



目 录

绪 论	001
上 编 中国文 化 史	
第一章 婚 姻	003
第二章 族 制	019
第三章 政 体	030
第四章 阶 级	041
第五章 财 产	053
第六章 官 制	068
第七章 选 举	079
第八章 赋 税	092
第九章 兵 制	104
第十章 刑 法	119
第十一章 实 业	132
第十二章 货 币	145
第十三章 衣 食	155
第十四章 住 行	168
第十五章 教 育	180
第十六章 语 文	190
第十七章 学 术	201
第十八章 宗 教	223
下 编 中国政 治 史	
第十九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235
第二十章 中国史的年代	239
第二十一章 古代的开化	241
第二十二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247
第二十三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252

第二十四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256
第二十五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259
第二十六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262
第二十七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265
第二十八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269
第二十九章	前汉的衰亡	273
第三十章	新室的兴亡	276
第三十一章	后汉的盛衰	279
第三十二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283
第三十三章	晋初的形势	286
第三十四章	五胡之乱（上）	289
第三十五章	五胡之乱（下）	292
第三十六章	南北朝的始末	295
第三十七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300
第三十八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303
第三十九章	唐朝的中衰	306
第四十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309
第四十一章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313
第四十二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317
第四十三章	北宋的积弱	320
第四十四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324
第四十五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329
第四十六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	333
第四十七章	明朝的盛衰	336
第四十八章	明清的兴亡	339
第四十九章	清代的盛衰	344
第五十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348
第五十一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	352
第五十二章	清朝的衰乱	356
第五十三章	清朝的覆亡	360
第五十四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364